



- 書名：《綿延的餐桌》、《流轉的街道》
- 作者：邱睦容、鄭安佑
- 出版社：蔚藍文化
- 出版日期：2020/12/16
- 竹女館藏：538.78/8753、481.1/8753



沂心集線上讀



書籍簡介：《綿延的餐桌》穿梭於府城大街小巷，展開一段米食文化的追溯之旅。從描述清代到戰後臺灣米糧生產、加工與銷售的變遷歷史，到挖掘府城人精神及物質生活中關於米食的存在印記，本書以米為起始，刻畫了臺南城市空間的興衰與遞移，也記錄一代代府城人傳承的美味記憶。《流轉的街道》則帶領你穿越時光長廊，探索屬於府城米糧的黃金歲月。隨著朝代更迭、統治者易位，臺南市與米糧相關的地景也隨之變遷。從清領時期隨城垣興建而形成的商販交易空間，到日治時期實施都市計畫，舊有米街漸為現代化道路取代。空間的演變牽動米糧產業發展，而關於米的日常經驗則澱積於歷史長流，成為府城人記憶中閃耀的金沙。

◆《流轉的街道》作者序〈「看見」的街景〉

接觸米糧議題，大概是從 2015 年開始，因執行「臺南市舊城區常民生活米糧相關文化資產調查計畫」，與十多位志工開始沿街逐巷地尋找米糧行，以古地圖套疊 Google Map，展開了在日常生活範圍的尋寶之旅。參與者包含我在內，大多是未滿 30 歲的青年世代，也是鮮少有米行記憶的一代，沒有童年聽著碾米機嘎嘎聲運轉的經驗，也不曾走進一間米行秤斤論兩地買米，儘管街角還是有些米糧行忙進忙出，卻很難成為被「看見」的街景。

「米業的興盛時期，臺南約有五百間米店。那是還沒有大賣場的時候，『家庭代工廠』盛行，人人都在家裡從事加工業，工作、吃飯都在家裡，因此吃米的量很大。週一到週五，整條路上都像空城一樣，路上只有送米和送瓦斯的人，沒有其他人車。」

從許多老闆的口中，未曾參與的、城市與米糧的過去開始一一浮現：米是如何坐著火車來到臺南市區，牛曾是載米的重要夥伴，臺南的米原來不可以越區到高雄賣，米糧業又是如何興起與沒落……。除了透過口訪回溯課本上沒教、長輩也不會主動去說的城市記憶，也運用地理資訊系統(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, GIS) 還原清末臺灣府城內與米有關的空間，曾經有過一條麻糬巷、茯苓膏街、米街、米粉埔，聽起來可口的地名；又，原來到了 1995 年，府城周圍內的米糧行數量，比今天同一範圍內的 7-11 還要多！這些「發現」逐漸建構起概念中模糊的府城米糧輪廓。在這本書裡，除了市區米糧行，也加上了來自產地碾米廠、大賣(tu ā -b ē，大盤商)、米食小吃從業者的說法，於是可見農業機具的演進、社會環境結構的變化、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，是如何具體而微地推移了生活的街景。

過往對於米的關注，較側重糧食與農業的大面向討論，近年來則以「飲食品味」之姿逐漸受人注目，但把米放回空間，每個地方的米糧行、碾米廠，介於生產與消費兩端，乘載著屬於各地的米糧記憶。家在屏東開設碾米廠的第二代告訴我，家鄉碾米廠的消失，來自於當地逐漸不種稻，因此無米可收；在後壁專門為庄頭服務的碾米廠，與在臺南市區進糙米來碾製與販售的米糧行，其消失與遷移也都有著不一樣的原因。以空間為引，由米糧行出發，看見米糧與當地百年來的變與不變。臺灣是米的國度，從鄉鎮到市區，都曾有米糧行、碾米廠的存在，或許這正是一種回頭認識地方的方法。

衷心期待這本書與姊妹作《延綿的餐桌：府城米食文化》能夠為米糧的歷史架起一個初步的布景，往後透過米，我們能與上一輩、下一代說起更多的故事。找一間米行上門買米吧！與老經驗的頭家們討教幾招煮飯的方法、嘗試幾種不同地方與品種的米，讓米糧行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裡。

◆《流轉的街道》內容摘錄

無聲的力量

「光復後不久的那時代，米價行情飄忽不定，一天之內可以暴漲好幾倍，所以我手裡握了一筆錢就趕緊去買米。只要有米，一切就好辦，餓不死人的。」——葉石濤，〈紅鞋子〉

在稻米產量過剩已非新聞、走入超市賣場就能隨手帶回一包米回家的當代社會，很難想像「米」曾被一輩人視為維生的基本單位，家裡的米缸必須有米才能安心，才有辦法活下去。

對於「沒有米」的恐懼源頭，或許是從日治末期的糧食管制為始。自日昭和 15 年（1940）第一期米開始，臺灣總督府依據〈米穀配給統治規則〉（1939 年頒布），米穀由政府管理其配給與流通，隨著戰事的膠著與空襲頻繁，米穀的取得不易，振香居餅舖的第三代陳淑枝女士回憶道，「戰爭的時候就沒辦法拿米，那時候已經是空襲的時代了，因我家做餅店的關係，還買得到米。但有一次我媽媽煮白飯，被警察聞到了，問：『妳的米哪裡來的？大家都沒有米可以吃，妳怎麼有米可以吃？』接著媽媽被警察打了一頓。」做餅店的人家還有辦法弄到米，但一般人家可就沒這麼幸運了。陳女士的先生，小時候家裡是開柑仔店的，因遇到空襲原料無法進來，柑仔店的規模小，申請不到米，不僅沒辦法做生意，連吃飯都有了困難。在這樣艱困的時刻，伸出援手的，是米行。時隔七十年，郭老先生猶記得：「現在青年路和民權路交叉口一帶有一間老米行，經營者喚『大粒』，姓吳。其妻人家都叫她『大粒孀』，為人很慈悲，戰爭的時候我還在當學生，家裡窮，大粒孀就曾贊助我們家白米。人家都笑她傻呀，米丟進運河裡還有聲音，送給人家什麼都沒有。」米送給人雖然無聲無息，但卻被記憶了超過半個世紀。

大粒孀的故事不是時代的特例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人民吃飽喝足的太平時代卻還未來臨。戰後初期的「米荒」，作為基本物資的米仍有許多人家吃不起，位於開山路的「成記米行」，老闆許水體諒大家生活辛苦，讓九成以上的家庭可以「欠米」—先拿米回家，有錢再還，甚至無償供應兩三戶付不起米錢的鄰居二十多年，直到對方的孩子長大成人。位於北門路的「德成糧行」定時會送上百包的米給育幼院；位於後壁的「義昌碾米廠」子女也提到，母親不僅捐米給鄰近的教養院、育幼院，逢年過節也會吩咐子女載幾斗米給需要的人家。

儘管今日社會看似富足，做米這一行也不若以往風光，但舊的風俗延續到今天，仍有米行默默在門口掛上「待用米」的牌子，不需出示資格證明，有需要即可領取。或著在廟會普度活動的會場，仍有米行與廟方合作供應「自強米」給需要的團體與家庭。從缺米的時代到今日，許多米行一直都在民間給予社會安定的力量。

米是替代貨幣

「臺灣真的變得糟糕啦。光復後，同胞們失業且挨餓著。」

「米一斤十幾元，糖一斤三十幾元，作夢都想不到的。」——龍瑛宗，〈可悲的鬼〉

過往在許多歷史的教科書上，或從長輩的口中，常常可以聽到「4萬元舊臺幣兌換新臺幣1元」的故事，因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不當的金融管制政策，使得貨幣惡性通貨膨脹，從1945年初至1950年底，短短五年間臺灣的躉售物價指數上升了218,455.7倍，在外吃一碗麵要好幾萬元，買一瓶醬油要九千元，罐頭更要上萬元起跳，也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在1949年6月實施幣制改革，以四萬元舊臺幣兌換一元新臺幣。

在這樣的物價波動的年代，與其信任鈔票帶來的價值，能填飽肚子的米更為重要。根據三順米行的粘老闆回憶，當時許多交易都是以米來計算的，例如租房子。當時如果要租一間店面，通常會和屋主談一個月幾石米（一石米=十斗米=約84公斤）作為房租，交房租就是交米；而工人的一日工資，大約是一斗米，每天領多少工資，就是看當日一斗米的米價多少，並不是固定的，而是以能買到一斗米的價錢為準。由於固定的工資、房租，都容易隨著物價波動，只有米不會，一斗米就是一斗米，能真實地滿足生活的基本所需，加上當時都是以三代同堂的家庭居多，食米的需求很大，因此大家都是賺錢就買米回家，一次買個十斗米也不稀奇，甚至會屯上一兩個月的量在家，不怕米生米蟲，只怕家裡沒有米。

買米演化史

現代人如果要買米，選擇不少。最常見的是到超市、量販店、便利商店等賣場，有人選擇網路商店宅配到家；注重產地與友善環境性的，可以選擇去小農市集、友善商店；也有人還是習慣上米行秤斤論兩地買。總之，賣米的場所多元，甚至在加油站也能拎一包米回家。然而時空退回幾十年前，買米可不像今天這麼簡單。

「以前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電話，如果要買米，會寫明信片過來叫米，信上就寫某日某時請米行送多少米到家裡。」德盛米行的蔡老闆這麼說。用明信片叫米，在今天聽起來可以說是前所未聞，一來一往就要花上好幾天的時間，但卻是以前人慣習的米糧買賣方式。現代人吃米的量少，多以小家庭為主，一次買米少超過三公斤，通常是自己上門購買。但在早期多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，一個月最多可是能吃到十斗米，這麼大的量，當然得請米行親送到家。因此住的近的人，直接上米行叫米；住的遠的，就打電話或寄明信片。米行接到客人的需求後，依照米量的多寡，選擇用扁擔、腳踏車或板車載米送過去，有時也會把米盛滿「斗」後直接外送。當時許多的米行都會選擇開在市場附近，或是乾脆在市場裡租一個店面，這樣顧客到市場買菜時，就可以順道叫米。

除了請米行外送到家，也可以在路上和騎腳踏車載著米的販仔購買。德盛米行就保有一個日本時代昭和 10 年的米籃 (bí-nā)，把米裝滿米籃後，帶到市場或是沿街販賣，買的人通常以篋仔 (kheh-á) 為單位，看一次需要幾篋仔，就從米籃裡取出相應的米，裝入篋仔，這是少量米的購買方式。

隨著電話的普及，叫米不再需要寫明信片或是親自上門，一通電話就能親送到指定的地方。當家庭結構從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，外食族群增加，米行送米的對象也從家庭轉變為餐飲業者，運輸工具也從人力、獸力，改為機車、卡車，車上載的不是「斗」，而是一袋三十公斤的營業用米。買米方式的演化，也是日常中活生生上演的歷史。

(出處：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web/sys_serialtext/?item=0010878845)

◎作者邱睦容個人網站：mu-jung.com/

